

# 一扇门背后的时代叩问 与巴蜀文化的精神突围

——评话剧《谁在敲门》

□ 邓丽娟



## 去蔽的真实与诗性抵抗

——评龚学敏《经济舱》

□ 罗倩



一个新诗写作者而言都意味着巨大的挑战，是屈服于传统，进行一种安全的写作，抑或是对它进行改造，并为之加入自己的新的创造？龚学敏选择了后者，他直面“互联网、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生事物”，以新的题材入诗。诗人前瞻性的目光并未仅仅停留在机器轰鸣的工业诗之上，而是更加敏锐地注意到尚未被诗歌充分表现的现实——高铁、飞机、网络……譬如说在他的《航站楼中的吸烟室》一诗中，他以一个常见却往往被诗人们忽视的地点准确地映射出当代生活的本质。一方面，我们处于高度流动的社会，作为连接与见证的航站楼无疑是最合适的“客观参照物”；另一方面，地理距离的缩短却并未减少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哪怕“另一座城市的兄弟与我一个姓氏”，我们的名字却是“黑色的仇人”，隔着玻璃，温暖亦是经过变形的虚假。“我”与其他人一样，都只是大世界中的“小积木”，被裹挟着“发射出去的旅客”……通过一个细小的切口，诗人准确地象征出当代人的存在：个体只是碎片，在荒诞的世界中浮沉。此类表达在这部诗集中屡见不鲜，他对新事物的使用并非出于装饰的必要，而是为了写出“真”与“诚”的现实主义诗篇，因此他所注意到的不是表象，而是本质。当他望见蓝花楹——在古典诗歌中通常用以表达爱与美的娇嫩的花朵，他写道：“天空的蓝被掐成一朵朵，安放在 / 从商标的刀片丛中，挣脱的 / 树枝上”（《商业中心楼顶的蓝花楹》）。在21世纪，他所望见的花一改典雅的身姿，历经艰辛从刀片丛中挣扎而出，这一描述使它褪去娇气，而仿佛沾染着血腥。商业的逻辑塑造着一切，甚至拟态出自然，曾经在狄兰·托马斯笔下“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在当今社会转变为资本的面貌，是“精致的商业 / 成为所有春天空调的发动机”，诗人沉痛地发现：自然并不是自然的。在龚学敏的诗中，社会的逻辑被层层剥开，这种剥开却不类似于春天剥开花朵，而更类似于仿生人突然发现了电路——一种更为现代的、全面且本质的东西。

正是这种发现，让他窥见了一个不一样的现实。和波德莱尔一样，他也写城市生活，他笔下的城市总是处于生病的状态。他似乎有意地去表现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戕害，譬如说在《电线上的鸟》一诗中，他写下了这样的语句：“冬天残酷，像是大地的筋 / 被一根根地，挑成了电线”。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物，电线如同城市伸出的触角，牢牢地盘织住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盘织住大地的广袤。当诗人将它与“大地的筋”并置，无疑暗示着工业社会中人类对自然剥皮抽筋般的暴虐。“农耕黑夜的大鳖，被灯光刺得 / 破绽百出”（《金属编织的咒语》），属于工业文明的灯光终于刺破田园牧歌图景的虚幻，以无可抵抗的姿态征服着自然。然而作为胜利者扩充着版图的城市也并不健康，它并未成为一个光鲜的礼物赠予人类，在《肾结石》一诗中，城市是“大地的牛皮癣”“结石”，生活在其中的植物病态而疯狂，“黄葛树在街边发疯”。于是生机在死去，原本流动的东西也变得僵硬，“高楼把从坝口刮出去的风的肺叶 / 切下，制成标本”（《风》），本应寄居在天空的风也只能留下“风的尸体”（《寄居在天空的风》）。飘散在空中的东西死去，空气也有了一种黏稠的质地，“雾的尸体是被淋湿的棉絮 / 盖在江南的身上”（《宿江南》），这一描述令人窒息。在这部诗集中，诗人避免着个人抒情的泛滥，他不直接写自己的疼痛，然而痛感却并未缺席。“菜市场痛成碎片”“戴着口罩的汽车在服务区咳嗽”（《病状》），世界如同“得病的地图”（《证据》），痛感蔓延。

这些诗歌具有生态主义的特征，然而读者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它们，仅仅用生态主义诗歌来进行概括可能流于表面。作为龚学敏二十余年创作的见证者，四川诗人干海兵曾如此评价龚学敏的新诗集：“龚学敏的笔触正从‘枝叶横生的奇诡’转向‘烟火人间的通透’，如同激流归于深海，在飞机掠过的新月与疏淡情感的快速时代，将高铁、网络等现代性符号淬炼为存在寓言。”在这部诗集中，我们可以看见这样的企图：在一个只有表征的世界中发现深度，祛除其对真实的遮蔽。因此，诗人赋予了自然、城市以生命，万物苏醒，它们编织着谎言，也经受着疾病和疼痛，正是在物与人的界限逐渐模糊的“狂欢化”中，新的现实得到表达。

诗歌无法直接介入现实，这是诗歌的局限，然而诗歌可以越过现实的虚假，以语言直击存在本身，这又是诗歌的崇高。“整整一皮卡车的谎言在高速公路上驰骋”（《皮卡》），远方的流言何其之多，它们飞速地行远快于真理。作为一个写作者，如何从混乱中为万物赋形，从流言中找出真实，把握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对诗歌技艺的考验，更是对诗歌趣味的检查。纵观诗人以往的写作和《经济舱》这部新诗集，我们可以发现，龚学敏并不写“平滑的诗”，而是不断面向写作的难度，其诗作也并非文字的游戏，而是呼唤着救赎的可能，寻找属于这个时代的诗性抵抗。

在日常生活中，对真实的遮蔽无关紧要，正是经由它我们平稳地滑进世俗生活的轨道。然而文学所要做的正是祛除遮蔽，并对事物进行还原。陈腔滥调早已失去复制的价值，如何越过它们去体现新诗之新？这一问题对任何一

本版责编：崔耕

话剧《谁在敲门》上演，无疑成为川渝戏剧界乃至全国话剧舞台的焦点。这部改编自罗伟章同名小说的话剧作品，以3代农民子女的命运沉浮为切口，将城乡裂变、人性挣扎等宏大命题浓缩于舞台上，堪称一部兼具文学深度与戏剧张力的“乡土精神史诗”。

### 主题内核： 城乡裂变下的命运交响

《谁在敲门》以川东许氏家族的变迁为叙事主线，编剧通过精心设计的许父人生三部曲——寿宴：80岁生日；医院：突发脑梗病危；葬礼：叶落归根，将家族史与时代史的互文关系，浓缩在3个充满仪式感的空间场域中。

大姐许春红的乡村坚守，大哥许春山的老实，二哥许春树的揣着糊涂装明白，老么许春响的懦弱，种种人物一登场，编剧巧妙地将社会批判转化为家族叙事，在身体退场与登场的轮回中，构建出一部充满诗意的当代中国乡村史诗。

每个角色都是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符号，他们的选择与困境直指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群体的命运：人在时代的裂变中，应当如何自处？到底是时代变了，还是人变了？这些问题，通过舞台上的“敲门声”，反复叩问观众，形成强烈的时代共振。

### 门里门外： 舞台空间解构中的城乡裂变与人性图谱

导演以“细节真实与诗意表达”为创作核心，通过舞台空间的解构与重组，将川东乡土社会的肌理与现代化进程的裂痕具象化。

在剧中，局部写实的川东坝坝与县医院走廊被并置于同一舞台，木质穿斗结构的堂屋、簸箕条凳等传统农具，与冷色调的医疗仪器形成视觉对冲，既精准还原了川渝地域的烟火气息，又暗示了

乡土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差异化。

“门”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意象，既是物理空间的现实存在，也是叙事的支点及象征。精心设计的敲门声构成命运变奏曲，其中最具讽刺意味的当属大姐夫李光文的“权力叩门”：送礼者“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送礼者的“隐身”不仅暗示李光文在城市化中的精神匿名状态，更预示其后续因贪腐“墙倒众人推”的必然结局。

此外，3次场景的门扉嬗变进一步深化话剧的主题。

一是寿宴之门。家族成员齐聚许春红家，为许父庆生。进出的身影看似热闹，却在细节中显露危机：看似清廉有钱的大姐夫搞起贪污受贿，因搞传销逃往哈尔滨的四喜又要再婚，儿子要再婚正在为钱愁苦的大哥，工作变革的老三春树……重重危机隐藏在这温情的面纱下。

二是医院之门。当许父病危躺在ICU，“救或不救”的争论与“用谁的车接父亲回老家”的算计，将传统孝道拆解为冰冷的语言。看似孝顺、和谐的一家人，却在现实面前被瓦解。

三是葬礼之门。许父的灵堂最终落回燕儿坡老宅，吊唁者们进出叩拜——门内是程式化的上香跪拜，门外是猪肉分配的争吵、二哥感情上的八卦。那些未能言说的愧疚与迟到的理解，都在门后被隐去。

导演透过“门”的三重空间嬗变，构成完整的时代寓言链，揭示了那些真正撕裂中国乡土社会的，从来不是有形的门槛，而是资本、权力与伦理在现代化转型中的精神绞杀。这亦使《谁在敲门》超越地域叙事，成为当代中国城乡裂变的立体解剖模型。

### 文化价值： 巴蜀文化的舞台重构

《谁在敲门》的深层意义，在于其对川

渝文化基因的挖掘与重构。

剧中，川东的烟火气与巴蜀人特有的坚韧、幽默、矛盾性格交织，形成独特的地域美学。例如，家族聚餐场景中的方言对白、川剧元素的隐现，既是对地方文化的致敬，也是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同质化的抵抗。

方言俚语的运用，强化了地域文化质感，独白与群戏的交错则形成复调叙事。编剧将原著中“生活流”的文学语言转化为戏剧台词，既保留原作的细腻肌理，又通过节奏与韵律的调整，赋予其舞台生命力。演员的表演亦堪称典范，以克制的肢体语言与微表情，将角色的复杂性层层剥开，使观众在“真实”与“间离”间反复切换，既共情于角色的命运，又抽离出对时代的反思。

更为重要的是，该剧超越了地域叙事的局限，将巴蜀经验升华为中国乡土社会的普遍性命题。正如首演结束后，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表示，从中看到了西南地区的生活，愈发理解了四川与重庆的独特文化，其通过小人物命运折射出的城乡矛盾、代际冲突、物质异化等问题，直指当代中国社会的精神症结。

### 结语： 门后的光与时代的回响

话剧《谁在敲门》精准地构建了巴蜀文化现代转化的戏剧范式。当叩门声在剧场回荡，观众听见的不仅是许氏家族的悲欢，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集体阵痛与希望。

话剧《谁在敲门》的成功，亦为文学作品的戏剧转化提供了范本。通过对小说情节的解构与重组，将小说中“清明上河图式”的宏大叙事浓缩为家族群像的微观聚焦，在舞台上实现了过去与现在、乡村与城市形成对话的场景，增强了戏剧的思辨张力。